

2017 年荊楚文化研習營 報告

黃淑莉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荊楚文化研習營是由蔣基會補助、史語所主辦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在這之前已經舉辦過六屆，這是第七屆。每一年都會以一個地方文化為主題，與當地知名大學的歷史系合辦，設計結合史料與田野的研習主題，由知名學者擔任講師，青年優秀研究者擔任導師，帶領學員深入考察地方社會的歷史與文化，幾乎所有參加過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學員，都會對此研習營的深度與廣度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報名參加荊楚文化研習營之前，我對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所推動的歷史田野十分好奇，也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參加，終於等到研習營的主題從遙遠的徽、晉、南京、齊魯來到和西南頗有淵源的荊楚，我就以理解荊楚文化和苗巫的關係為由提出參加申請，也很幸運地被主辦單位接受，獲得參加荊楚文化研習營的入門票。

六月份開始，陸陸續續收到來自荊楚文化營的消息，就越來越有這個營隊是在玩真的感覺，尤其是在收到課程表和上課資料的電子檔後，更是一整個崩潰。田野閱讀材料是數百頁的地方誌書和碑刻，課程講義的指定閱讀光是講義就有四五百頁，還不加上指定專書。量多或許不是問題，如果有脈絡快速閱讀，儘管讀得不深，還是能對材料有基本的把握，真正讓我完全崩潰無所適從的是一不知從何讀起。田野材料是不熟悉的古文，讀起來拗口，不熟悉湖北歷史地理、史料背景，根本不知這些零碎片段的史料應該要怎麼讀，可能會有什麼迷人之處。指定閱讀有思想史、文學、考古、古文字學、宗教研究、物質文化各式各樣，時間向度從舊石器時代、上古、中古到近代，上下七、八千年，指定閱讀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知識含量都很高，都得花費一番心力閱讀整理和思考，完全沒有「一言以蔽之」的可能。

即便所有閱讀材料都翻過了一遍，感覺自己對荊楚文化的了解還是一張白紙，對武漢營的研習內容還是一頭霧水。一直到上飛機前，我還是很焦慮，這麼多的閱讀材料，到底我該從何下手，才能勉強勾勒出自己對荊楚文化的初步認識呢？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飛機，開始了我在「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十二天的學員生活。

此次荊楚文化研習營是在武漢大學舉行。一下飛機我們就被安排住在武大附近的豐頤賓館，距離上課地點歷史學院的教室，大約是步行十五分鐘的距離。除了田野行程以外，從豐頤賓館到歷史學院的這一段路我們每天都得走上一兩趟，

這段路的沿途景致也就構成了我們對武大校園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

研習營主要分成課程與田野調查兩個部分。

課程分五天進行，早上、下午各有一講。講師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思想史學家王汎森、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文哲所的魏晉唐宋文學研究者劉苑如、政治大學知名宗教學者李豐懋、文哲所明清文學研究專家胡曉真、故宮博物院的玉器研究專家鄧淑蘋、武漢大學的江漢考古學家余西雲、楚簡研究專家陳偉、鄂東南地方社會史研究者楊國安、廈門大學的民間信仰研究專家鄭振滿等。課程內容在時間向度上，從明清到史前都有，在研究領域上文史哲幾乎無所不包，唯一的共同點是這些研究都和「湖北」這個地方有關，有從湖北出土文物出發探討江漢地區的文化變遷（余西雲）和楚人的宗教（陳偉）、以及湖北在華夏文明構成中的地位（鄧淑蘋），或者從湖北的文人作品探討湖北學風（王汎森），或者文學作品中的湖北（胡曉真）和神話傳說中的湖北少數民族（王明珂），從歷史和田野中探討湖北的宗族與社會構成（楊國安、鄭振滿）、宗教論述和社會動員（李豐懋、劉苑如）。

田野調查有四天的時間，從湖北東南武漢出發向西北前進，奔波數百公里，途經明嘉靖年間「大禮議」的濫觴之地鍾祥、清中期白蓮教徒群聚發難的襄陽、直抵陝鄂邊境太和山上明永樂帝冊封的武當山，返程中途在隨州停留，參觀楚墓考古挖掘重鎮曾侯乙墓的所在地隨州。田野調查接觸到的地理人文景觀、搜索到的碑刻文物，再加上田野閱讀材料所提供的地方誌書，我們這些學員就會被丟進滿滿「材料」的大海之中，茫然不知從何捕捉「荆楚文化」的樣貌。

除了課程與田野之外，研習營另一個最重要的學習場域是小組討論。在經過一整天課程和田野的腦補之後，每天晚上的小組討論時間都是最精彩的腦動時刻。小組討論由田野老師帶領，在大歷史的脈絡下定位理解地方社會的視角，再從文本與田野的細節中，構建一個能夠展現地方社會樣貌的歷史敘事。由於學員當中，有七成以上不是歷史專業，大多數學員更是完全沒做過田野調查，將史料與田野結合的研究方法對多數學員而言，都是全新的操作方式。因此，一開始的小組討論並不是很進入狀況，小組報告也有些抓不到重點，但在每天晚上的反覆操練之下，研習營最後幾天晚上的小組報告，每個小組都能清楚地從史料與田野中找到材料構建歷史敘事的假說，期間來自他組學員的挑戰更是淬煉假說的試金石，攻訐防守過程精彩有趣。

和大多數的學員一樣，我是抱著瞭解荆楚文化的求知慾望來參加研習營，原以為經過十二天的研習營，可以大抵的勾勒出荆楚文化的樣貌，實與願違，不論

是課程、田野和小組討論，「荊楚文化」這個概念從來沒有出現過。課程的內容、田野的觀察與小組最後構建的歷史敘事，反倒是不斷地挑戰「荊楚文化」做為一個理解湖北地方社會與歷史的概念的合法性。事實上，王鴻泰老師和李孝悌老師也在最後的總結中，將此次研習營定位在解構荊楚文化，而非定義荊楚文化。通過結合史料與田野的操練，研習營的目的是讓學員能夠從地方社會的視角提問，構建以地方社會為主體的歷史觀。研習營構建了一個跨學科對話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荊楚文化」只是個將不同學科領域連結在一起的「標籤」，標籤有很多種不同的用法和意義、也有很多種不同的展現方式，只有通過田野和史料的解讀與分析，以具體事證回應地方社會的主體性，才是跨學科對話最有價值的知識效應。

從跨學科對話的角度來看，誠如我在最後一天的學員分享中所提到的，歷史學和人類學都是從很多細節累積建構的知識，最大的不同其實是參與建構知識的社群不同，這個差異也展現在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不同的田野調查方法。從參與研習營的歷史田野中，我學習到歷史學家結合史料和田野的研究方法，從田野中獲取的材料必須結合誌書史料，由歷史學家來解讀和分析，建構出所謂的歷史知識。由此，田野與史料的分享與溝通所形成的知識社群是歷史學家。田野調查在人類學的知識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歷史知識生產非常不同。人類學家通常都是單槍批馬的做田野，田野調查即是一個融入過程，田野調查的方法是參與觀察，這也就意味著人類學家在田野裡所蒐集到的材料，是人類學家和被研究對象不斷互動中的共同產出，由田野調查所構建的知識社群其實是被研究對象與人類學家所共同形成的知識社群。這個根本的差異，使得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知識結構有著巨大的分野，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歷史知識的主題、是被建構的主體，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卻是能夠參與知識生產的行動者，行動者的現身使得人類學知識主體呈現不穩定的狀態，這個不穩定狀態往往迫使人類學知識必需不斷地自我更新。或許歷史知識社群不需要人類學家，但在面對相同的田野與史料時，人類學所構建的知識必然是歷史知識的在地回應。

現在回頭看來，我更想把這十二天的研習，視為是一次難得田野調查經驗。我必須強調我絕對不是一開始就是以參與觀察的心態參加荊楚文化研習營，恰恰相反，我是抱著瞭解荊楚文化的求知精神加入研習營，也是在探索與解構荊楚文化的過程中，逐漸融入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卻又在參與荊楚文化的知識生產過程中，成為不斷被擠出歷史知識領域的他者。十二天的參與觀察也只是蜻蜓點水淺嘗則止，我的結論當然不會有什麼重要的內涵（其實還蠻膚淺的），只是想要點出：走進田野的歷史學，雖然不再只是廟堂之學，能夠有多麼「接地氣」卻是完全取決於歷史學者的問題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歷史與人類學的「尷尬關係（Awkward Relationship）」（套用人類學家 Marilyn Strathern 用來形容女性主義和

人類學的詞)，也是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在高舉田野大旗的歷史文化研習營中揮之不去的切身感受。這不是歷史學和人類學誰比較強的問題，就如同田野調查之於人類學知識和之於歷史知識，完全是兩碼子的事，本來就該有不同的趣味。